

第二十九章 加長的沙發

中日之間的軍事沖突沒有像上次那樣被英國公使成功地調停，盡管現任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爵士(Sir Hughe Montgomery Knatchbull Hugessen)盡了更大努力，甚至在赴前線調停的途中遭到日本軍機誤炸受傷。

沖突惡化成全面戰爭，戰爭進入了第二個年頭，戰線從上海向揚子江中游轉移，上海地區的戰火漸漸平息下來。上海租界因其特殊地位，形成了自中國長毛內亂後第二次“孤島”式的太平世界，給揚子江下游的大量戰爭難民提供了慷慨的庇難所。跟1860年代相仿，戰爭難民給租界帶來了空前的擁擠、不安和繁榮。1938年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租收到達折合1000萬兩銀子的貨幣，是1864年租收的一百倍！

工部局竭盡全力維持民生常態，使租界沿著九十多年來在黃浦江畔這塊土地上形成的規跡，原樣過下去。如果為了適應周邊的巨大變化不得不作出調整，那麼執行調整時務必將擾民程度降到最底點。這一點，從工部局董事會本年度的每兩周周會記錄上清楚地反映出來。

1938年5月5日的周會上，總董樊克令(Cornell Franklin)通知各位董事，日方上海無線電監督處負責人淺野少佐和日本公使館一等秘書田鳩已經同意考慮工部局提出的抗議，採取克制行動，不在公共租界強制執行中國人擁有的電台必須向日本當局登記，以確保中國人的電台不播放反對日本或其他政治性節目。工部局和日方達成諒解，由工部局授權巡捕房監督中國人的電台不播反日節目，而這種監督並不包含日方原先要求的規定各電台的波長和頻率。

1938年7月6日的周會上，總董談及收到一家法國彩票公司的來信。工部局曾經批准

該公司在公共租界銷售救濟戰爭難民的彩票。現在該公司在信中同意工部局所提出不允許出售其他彩票的意見。關於工部局提出應將收入移交上海國際紅十字會分派給得到正式承認的難民機構一事，該公司稱其負責規定分派工作由該公司董事會所委托的特別委員會進行，工部局兩位董事的名字已經包括在該公司試行的彩票分配委員會中。所以，總董認為委員會的組成情況足以向工部局保證彩票收入能夠得到合理安排。

在同一次周會上，總董提及工部局決定在7月10日前暫不允許巡捕房根據地產業主的請求參與協助驅逐無償佔據業主房產的戰爭難民。工部局已收到各難民救濟機構的一份聯合申請，要求再次推遲巡捕房的此類行動，因為他們尚未找到另外的收容所房屋。總董向華人董事奚玉書先生保證，除非找到另外的難民收容處，否則工部局將不會准許巡捕房採取驅逐行動。

1938年7月20日的周會上，為方便和加速難民自房產主希望收回的房屋中搬出，董事們批准了根據致國際紅十字會草稿所寫的信。該信提及由國際紅十字會、難民創始機構、難民問題顧問委員會以及工部局各處組成難民收容所遷移委員會，該委員會的職能就是起草一份計劃，說明難民從這些房屋遷至新收容所去所持的態度和次序。

1938年8月5日的周會上，工務處代理處長說，最近他查看了幾處可能作為難民收容所的地皮。他預期在租界內可以有11塊空地，再加上在邊界線上的第12塊土地足夠為30000難民提供住所。這12塊土地將會提供所需的90畝地皮，這樣就能按他與衛生處長同意的設想建一每畝平均人口密度為360人的難民收容所。對比之下，救世軍辦的難民收容所的人口密度過高，每畝地達750人。關於每畝地的租金問題，工務處長估計為每月總額約一萬元。

上述工部局董事會反復討論的難民和難民收容所問題甚至超出了中日軍事沖突的範圍。1938年開始，從德國、奧地利、波蘭有2萬猶太人逃避納粹迫害，來到上海租界定居。多年後，人們把這份功德歸因於中國人的好客。其實，吸引猶太難民最主要的原因是上海

公共租界不受任何外國政府管轄，是當地華洋居民自治的地方實體，是世界上唯一不需要護照或簽證就可進入、生活水准卻跟他們原來居住的地方可以匹配的地方。

歷經顛簸的猶太難民來到上海，迎來一波波救濟熱潮。第一波救濟來自上海最資深的猶太社團：伊拉克猶太佬。以沙遜家族、嘉道理家族、哈通家族等超級富豪牽頭的上海當地猶太社團慷慨解囊，向每位難民每天提供5美分生活費，保障難民的基本生活。第二波救濟來自美國的猶太社團和國際紅十字會，在公共租界向猶太難民提供醫療教育福利。第三波救濟來自一個最不可想像的地方：日本當局。

出於一廂情願的想法，日本當局認為猶太人都是有錢人，討好猶太人可以使有錢的猶太財團投資開發“滿洲國”，並且通過猶太財團影響英美政府接受日本在遠東擴張的既成事實。因此，日本當局在為猶太難民尋找住所這件事上同公共租界工部局和各難民救濟機構十分合作，幾番協調後，各方同意虹口“日租界”提籃橋一帶為最適合猶太難民居住的地方。因為英國業廣地產公司（Shanghai Land Investment Company）在那個地區開發許多房地產，戰爭爆發後，中國居民大批逃離那個地區，造成大批房屋空置，剛好讓猶太難民入住，業廣公司可以繼續收租。

定居在提籃橋一帶的猶太難民開始擺起地攤，出售他們逃難帶出的財物。不下雨的日子，華德路（長陽路）猶太摩西教堂附近的街面可以說是一個猶太集市大雜燴：年老的夫婦向過路人討價還價出售古董級高檔傢具；中年人向過路人展示皮草、首飾、收音機、鋼琴、汽車；少年人高聲兜售掛表、皮鞋、玩具；家庭主婦出售剛出爐的自制猶太面包。。。

容定的汽車在9月30日那天途經華德路時，老樂不得不小心翼翼放慢車速，以免撞到路人或無處不在的地攤。

自從去年中日發生軍事沖突以後，這是容定第一次來到這個地區。如果不是陳則民要離開上海，鬆崗少爺邀請容定參加替陳則民送行吃飯，容定是不會到這個地區來的。這裡同蘇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相比，當地日本僑民慶祝軍事勝利的味道特別濃，令容定很反感。

但是，容定從不拒絕任何吃飯的邀請，盡管他連陳則民離開上海要去什麼地方都不清楚。

鬆崗請客吃飯的餐館叫“六三花園”。餐館門前有典型的日本裝飾，挂著紅黃相間的紙燈籠和五彩繽紛的小旗。鬆崗訂下的包間在二樓，通向包間的樓梯比普通日本餐館的樓梯要寬，足以容納兩個端著盤子的女招待同時上下，顯出這家餐館的氣派不凡。包間裡的矮桌後面擺著有靠背的織錦坐墊，矮桌上放著象牙筷子、精致的瓷器餐具、洒上淡淡香水的手巾。

兩位穿深色和服系細腰帶的中年女招待端上一盤盤粉紅色和乳白色的新鮮生魚片。跟別處日本餐館提供的日本抹茶不同，這家餐館提供的是濃儼茶。兩位女招待用象牙筷子夾去浮在茶水表面的茶梗，給主客三位斟上茶。鬆崗向她們使了個眼色，她們便悄然無聲地退出包間。

不等容定開口詢問，鬆崗頗為興奮地告訴他陳則民前輩要回蘇州老家主持一些大事，下次何時回上海，現在說不上，所以特地請容定前輩作陪，替陳則民前輩設席送行，感謝陳前輩多年對自己的關照。

“陳大律師要回蘇州開業嗎？”容定放下夾起一片鱸魚的筷子，很驚訝地問。

“不是開業，我這次是要回蘇州替鄉親父老賣力。”陳則民得意地回答。“仗打輸了，政府跑了，家鄉一團混亂，需要有人出來收拾局面，老百姓才能重新安居樂業。所以，我決定回蘇州主持家鄉的安定大計。這件事，鬆崗君是很贊成的。可是設席送行，實在受之有愧，受之有愧。”

容定立刻明白陳則民是要回家鄉替日本軍方做事。七年前，商埠印書館董事鄭孝胥去“滿洲國”當總理大臣，曾給容定帶來莫大震撼，他聽從四子容穗的意見將鄭孝胥贈送的題字從書房的牆上撤下。但是人家鄭孝胥畢竟是前清遜帝的老師，遜帝當了“滿洲國”皇上，老師去幫忙，不脫人情之常。那麼，眼前這個陳則民又是為什麼要去蘇州替日本軍方效勞，而一貫反戰的鬆崗居然支持他這麼做呢？

“鬆崗少爺你支持陳前輩這麼做？”

“容前輩，我猜想你誤會了。我支持陳前輩這麼做是因為我痛恨日本軍方鬼迷心竅，一味擴大戰火，給中國老百姓帶來莫大痛苦。要鬼迷心竅的日本軍方在節節取勝的現在停止戰爭是不現實的。既然停止戰爭暫時做不到，減輕中國百姓的痛苦就是當下務實的課題。我一直在想，如果去年年底日本軍隊打進南京時，如有一個中國人組成的機構同日本軍方打交道，局面就不會那麼混亂，那場使日本在國際社會顏面掃地的日軍暴行就不會發生，這樣對日本，對中國，尤其是中國老百姓，不是都好嗎？所以，我聽到陳前輩要回蘇州主持當地的和平局面，很高興。至少，我覺得這跟我去年在上海南市協助賈基諾神父開展難民收容所的工作，沒有什麼兩樣，對嗎？”

鬆崗指的是去年他根據法國籍賈基諾神父的請求，協調日本領事田中正一跟神父談判，派遣日本憲兵隊塚本大尉率領二十名日本憲兵守在神父在南市辦的難民收容所門口，阻止日本軍人闖入難民收容所搗亂，從而使神父的難民營工作得以展開。

容定覺得鬆崗的話不無道理，但是他覺得還是缺乏點什麼使自己不能從認可鬆崗幫助賈基諾神父，進而認可陳則民回蘇州之行。那麼，到底缺乏什麼呢？陳則民接下來的一番話使容定找到了缺乏的那點東西。

陳則民從容定的臉色，看出容定並不認可自己的回鄉之行。他剛想張口解釋，兩位中年女招待回到包間，送上新的一盤盤生魚片，撤下吃剩的空盤子，並且給主客三人重新斟茶。

女招待們再次悄悄地離開包間後，陳則民對自己的回鄉之行作了解釋。

“容大律師，我相信你是最合適對我賜教的人，因為你一沒有黨派，二沒有當過官，可以完全用不帶偏見的眼光看待我的決定。我是這麼想的，今天的蘇州是日本人的天下，就像今天的上海租界是英國人的天下，兩地都不是中國人的天下。上海租界的華人正在安居樂業，我回蘇州就是要讓蘇州的華人也快些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這同容大律師今天在租

界當律師為租界居民的安居樂業作貢獻，請教有什麼兩樣？”

容定想了一想回答：“我覺得上海租界跟今天的蘇州，性質不一樣。上海租界原先是荒灘，沒有人煙。當初主要靠洋人努力，才有上海租界的今天，人口超過百萬，成了遠東僅次於東京最繁華的城市。執行市政府功能的工部局董事會裡有五位英國董事、五位中國董事、兩位美國董事、兩位日本董事，每位董事具有同等份量的投票權，而這些董事又都是從各國納稅人會議選出來的，所以上海租界實際是一個各國居民組成的自治社會。在租界，領事裁判權的範圍已經縮小到僅適用於條約國（treaty country）的本國公民。即使在領事裁判權沒有縮小前，華人要求平等對待的訴求也從來沒有受到粗暴打壓。比如說，我本人在上海棄清獨立後代表華人商會要求駐滬領事團撤銷對會審公廨的督導，英國人並沒有因此撤銷我的律師資格。在法庭上，老百姓可以告工部局，年年有華人打贏洋人的官司。總之，英國人也好，法國人也好，美國人也好，在上海租界，法律上華人跟他們是平等的。再看看今天的蘇州，不要說享受跟日本人平等的地位，連電台的廣播內容都受到監視，不允許有任何同日本軍方不同講法的節目，老百姓看到日本兵都要強迫脫帽鞠躬，這個樣子怎麼談得上安居樂業呢？陳大律師，我勸你三思後行。”

聽了容定的話，陳則民臉色發紅，一時答不上話。鬆崗覺得容定的話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並不能使他改變支持陳則民去蘇州。他覺得聯合通訊社的一位記者同事發表過的一篇文章足以辯清陳則民的立場。

“容前輩，我的一位同事今年二月在《改造》雜誌上發表過一篇題為《進入事變第二階段》的文章。其中最後一段最能表達我支持陳前輩去蘇州的理由。文章裡大致是這麼說的：‘我們必須全力協助佔領區內的居民，盡快實施仁政。請想象一下手持日本國旗，茫然站立在路邊的老人，想象一下那些難民收容處的兒童，唱著不知含意的《君之代》歌曲無聊地戲耍，想象一下年輕母親抱著飢餓的乳兒在寒冷的天氣裡乞討，他們到底有什麼罪呢？’容前輩，為什麼難民們還不能離開收容所呢？這是因為難民們的家鄉正處於混亂狀

態，據我所知，現在在佔領區為日本軍方做事的華人都是一些層次很底的地痞流氓，他們正在趁火打劫他們的華人同胞。所以，佔領區裡非常需要像陳前輩那樣有學問有品德的高層人士去收拾局面。”

鬆崗的話顯然給陳則民很大鼓勵，他接過鬆崗的話題說：“事情確是這樣，目前蘇州的局面亂透了，城外的大米怕被日軍沒收，不敢運進城，城裡的米價瘋漲，流氓地痞趁機敲詐老百姓。我這次回去，第一件事就是要安撫我認識的糧商們，把米運進城，這樣米價才會降下來。容大律師你說說看，這樣的景況，我能不回蘇州去嗎？我去蘇州後，要是上海律師公會問起我的下落，還希望容大律師替我向公會的同仁解釋我的苦衷，不要對我產生誤解。”

說到這裡，陳則民合攏雙拳，向容定作了一個非常中國化的揖。

對於陳則民的要求，容定覺得很難決定答應與否。一方面，容定心底裡仍舊不能認可陳則民的蘇州之行，另一方面，容定覺得鬆崗和陳則民說得都有幾分道理，而依照容定的個性，正確的就是正確的，錯誤的就是錯誤的，不存在隨機應變，用減低真相的代價，來減輕真相的殘忍面目。任何是非不清，必須搞得清清楚楚才能作結論，而不是模稜兩可的敷衍過門。那麼，到底該答應陳則民的要求嗎？

女招待托著一個盤子拉開包間的紙門走了進來，打斷了容定的思路。

女招待的盤子裡不是什麼生魚片，而是一張紙條。鬆崗唸了一下紙條，馬上要女招待遞給容定看。紙條上寫著：“請高易律師事務所容定律師下樓，有急事。諸啟。”

容定認得紙條上的字是律師事務所裡的大寫（文書）諸先生的筆跡。咦，這位隻會抄抄寫寫的諸先生怎麼找到自己找到餐館來了呢？今天中午離開律師事務所時，沒有關照什麼重要文件讓諸先生抄寫呀？

容定跟著女招待下樓，在餐館門口看到一臉愁容的諸先生正在等候自己。容定跟諸交談了一句話，臉色大變，立刻轉身上樓向鬆崗和陳則民匆匆告辭。

五分鐘後，容定和諸先生坐著老樂開的汽車向諸先生的岳父唐紹儀家駛去。途中，諸先生詳細地告訴容定唐府發生的大事。

岳父唐紹儀通常早上八點用早餐。餐桌上擺著三副餐具：英國瓷器杯盤、高腳玻璃杯、以及銀器刀叉。他的妻子吳夫人最近去香港小住，所以陪同他用早餐的是第十一女兒寶瑤小姐和女婿諸先生。早餐的內容是洋蔥土豆作配菜的煎腌肉、鮮果汁、烤得焦黃的面包、和又濃又香的土耳其咖啡。

唐紹儀習慣在早餐後邊喝咖啡邊閱讀當天的報紙。聽差老曹遞上七八份中英報紙時，女兒女婿便告退離開餐廳。聽差老曹個子很高，臉龐瘦削，穿著上等的花呢全套西裝，他和寬肩膀、脖子粗壯、終年穿著長衫的門房老焦都是跟隨唐紹儀多年的仆人，他們倆負責唐的飲食起居和警衛工作。尤其是門房老焦，像是天生的心理學家，一眼就能看透訪客的身份。在他寬大的長衫下，終年佩戴著手槍。

唐紹儀拿起《申報》仔細地閱讀起來。

今天的《申報》頭版既沒有用報導日軍在佔領區的狂妄行為，也沒有用報導中國軍隊似是而非的戰績，更沒有用報導雷聲大雨點小的西方外交干涉來激怒年輕讀者，或是使成年讀者失望。今天的《申報》頭版卻出現一些好搬弄是非的記者撰寫的關於日本軍方正在物色中國高層人士去佔領區安撫中國民眾的猜測文章。這些文章用藏頭去尾的方式，暗示日本軍方的物色工作在北方集中在某個下野的軍人統帥身上，在南方集中在某個退休的總理級人物身上。通過人物的年齡、籍貫、現在的居住地，暗示那個退休的總理級人物就是他唐紹儀。

這類報導，唐紹儀以前在報上也見過。但是，今天《申報》上的報導或許為了迎合讀者的心理，過分加油添醬，好像他唐紹儀已經跟日本軍方達成某種協議，使唐紹儀看了很氣憤。他唐紹儀一生關心因滿清腐朽而積弱受欺的國家前途，即使在五十四年前，中國處於比今天遠遠虛弱的年代，他都能在朝鮮國贊助袁世凱三天之內救出被親日派劫持的朝鮮

國王，平定日本人策劃的朝鮮宮廷政變。更何況在洋人確保治安的上海租界，已經退休的他怎麼可能輕易跟日本軍方走到一起去呢？他唐紹儀為了開發中山港，連屈就中山縣長那麼丟身份的事情都肯自願去干，還不足夠說明他是一個為了社會肯犧牲自己，決不嗜權成癮的人嗎？到目前為止，日本軍方透過他大女婿同他的每次接觸，內容都暗中告訴那個正在節節撤退的中國政府。說白了，他唐紹儀是在替中國政府打探日本軍方是否肯停戰的底線。

有時候，唐紹儀真想起訴那些搬弄是非的記者。但是，他顧慮到訴諸法律會造成更大的新聞轟動，反而成就了那些記者語不驚人誓不休的心願。

“老爺，趙先生來了。”聽差老曹前來報告。

“請他在客廳見。”唐紹儀放下報紙和心裡的煩惱，站了起來。

趙先生是通過唐紹儀的一位老朋友的兒子介紹來的一位古董商人。門房老焦記得這是趙先生第三次來訪。第一次是唐紹儀老朋友的兒子謝少爺帶他來介紹給酷愛收集古董的東家；第二次是趙先生獨自上門拜訪，跟東家談了很久，談得很高興。儘管已來過兩次，趙先生進屋前仍然抬起雙臂讓老焦仔細地上下檢查自己後才跟著聽差老曹來到客廳裡坐下。

趙先生長得溫文儒雅，修長的個子，薄薄的嘴唇，白皙的臉龐上鑲著一對流星般靈活的眼睛，右手中指戴著一枚鑽石戒指。唐紹儀走進客廳的時候，趙先生端著女仆送上的茶，正在饒有興致地欣賞牆上那幅繡著西方古典故事的壁毯。

“趙先生，是不是看中這幅波斯壁毯了？對不起，這幅壁毯世界上隻有兩塊。我是不會用它來跟趙先生交換古董的，請。”唐紹儀請古董商人坐下。

唐紹儀認為世界上有兩類古董商人。第一類是唯利是圖的黑心商人，一味漫天要價，誰出的價錢最高，就將古董賣給誰。第二類是講究格調的精明商人，經過考察，覺得買家有格調欣賞一件古董後，才開始討價還價，以最高的價格售給買家。趙先生屬於第二類商

人，前兩次來訪是為了探明唐紹儀到底有沒有格調欣賞他手裡的一件珍品。經過交談，趙先生覺得唐紹儀對宋朝官窯瓷器的胎骨、釉色、造形、制作過程有相當深的研究，才告訴唐紹儀他手裡有一隻北宋官窯的青釉瓷花瓶待售。唐紹儀聽了很感興趣，因為他已經擁有一隻南宋官窯的白釉瓷花盆，盼望得到一件北宋官窯瓷器，從此湊齊兩宋的官窯。這次來訪前跟趙先生預先說好是要看貨成交的。

“趙先生，那件東西怎麼沒有帶來？”唐紹儀看到趙先生兩手空空，有點不滿地問。

“唐大人，東西帶來了，在門外我的汽車裡，我們先談攏價錢，然後驗貨，怎麼樣？”

“哪有不看貨先定價的道理？”

“是這樣的，天津的張鳴歧大人願意出十萬元買這件東西，康聖人（康有為）的女公子康同璧願意用宋代范成大的真帖交換這件東西，這是現在的行情。”

“你這麼說，是不是為了抬高這隻瓷瓶的身價？”

“他們兩家都不是內行，所以，我給唐大人優先權。在商言商，請唐大人不要讓我吃虧。”

“好吧，依你。把東西拿進來。中意的話，今天就開支票給你。”

趙先生站起身朝唐紹儀鞠了一躬，退出客廳，走出唐府。

十分鐘後，趙先生捧著一隻一尺見方的雕花黃楊木箱回到唐府，經過門房時，他打開木箱讓老焦檢查箱子和裡面的古董。

“跟我到書房來，我要仔細看看這件東西。”唐紹儀對捧著黃楊木箱的古董商說。

跟客廳相聯的書房，窗戶面向後花園，非常幽靜。除了從後花園別處看不到書房內的動靜。書房裡有一隻加長的五人座長沙發，唐紹儀請趙先生跟自己一起在加長的沙發坐下。沙發旁有一隻三格抽屜的首飾箱，唐紹儀從口袋掏出一把細巧的鑰匙，打開最上層的抽屜，取出一把放大倍數極高的放大鏡，然後從古董商手中的木箱裡取出那隻青灰色的北宋官窯瓷花瓶。

瓷花瓶上有一些不成規則的凹凸紋痕。這些紋痕是在燒制過程中釉胎膨脹造成的，稱作冰片。冰片的模樣反映出不同年代的工藝，是簽定這件瓷花瓶的年份最重要的標記。唐紹儀彎下腰，把臉最大程度湊近放大鏡，聚精會神地察看瓶壁上每一道冰片。

古董商人悄悄用右手中指上的戒指按住木箱壁上的一處花紋，像開鎖一樣擰了一下，木箱箱壁的夾縫裡露出一片藍森森的鋒利金屬，木箱的那處箱壁同時上下分離，形成一柄袖珍鋼斧。

古董商人舉斧對准唐紹儀銀發復蓋的後腦勺砍去。。。血點撒在加長的沙發上像噴水池噴出的紅色水花。